

# 试论黄宗羲教育活动 和教育思想的历史影响

金 林 祥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学术大师,在史学、经学、哲学、文学、自然科学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在历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 一、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

所谓“清代浙东学派”,是一个以地域定名的清代学术流派。其名最早见之于清朝著名字学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他专撰《浙东学术》一篇,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这个学派的学术渊源,代表人物以及学术风格等重要问题。章学诚的这个定名,为学术界所称道和接受。例如,何炳松在1932年所著的《浙东学派溯源》一书中,就认为章学诚所定“浙东学术”的名称,比全祖望所用的“浙学”,“婺学”、“永嘉之学”三个名词都更贴切。清代浙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均是宁波府和绍兴府的人。因此,如果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清代浙东学派实际上是指在浙东宁波和绍兴地区形成而逐渐展开去的一个学术流派。

为什么会在清代浙东的宁波和绍兴地区形成这样一个著名的学术流派呢?不少学者曾分别从浙东优越的经济地域条件,良好的文化学术条件,以及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等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讨。应该说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颇有启发的。但是,需要作重要补充的是,探讨清代浙东学派形成的原因,还必须同黄宗羲在浙东的讲学活动联系起来考察。因为任何学派的形成都离不开学派创始人的教育活动。例如,春秋时代孔丘创立的儒家学派,墨翟创立的墨家学派,后来宋明时代出现的“濂学”、“洛学”、“关学”、“闽学”“心学”等学派,都是如此。同样,清代浙东学派之所以在浙东的宁波和绍兴地区形成,其根本原因是因为黄宗羲在绍兴证人书院,尤其是在甬上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换句话说,正是由于黄宗羲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为清初宁波,绍兴地区培养了一批史学、经学、文学等方面的人才,他们继承和发展了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转相传授,终于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学术流派。黄宗羲的讲学活动,孕育了清代浙东学派。具体来说,突出地表现为:

### 1. 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凡是一个学派,总有其代表人物,成为本学派的支柱。有关清代浙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虽然目前学术界的看法不完全相同,但下面这四位却是大家所能共同接受的,他们是黄

宗羲、万斯同、全祖望和章学诚。

黄宗羲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开创者，这素来为学术界所公认。章学诚在《浙东学术》篇中说：“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流而流长矣。”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得更明白：“清初讲学大师，中州有孙夏峰，关中有李二曲，东南则黄梨洲。……三先生在当时学界各占一部分势力，而梨洲影响于后来者尤大。梨洲为清代浙东学派之开创者”。还说：“黄梨洲是清代史学开山之祖”，是浙东第一位史学大师等。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亦谓：“梨洲之为学，则实创清代之新局矣”。由此可见，黄宗羲开创清代浙东学派，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及门弟子。早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他就到余姚化安山受业于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中，他虽然年龄小，但同学在学习“遇有疑义，辄片言析之”。他“深于经”，兼工名理与古文辞，而尤以史学著称于世。是黄宗羲在史学方面最有成就的学生。黄宗羲在列举甬上学生的高足时，首列“万季野之史学”。万斯同“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康熙十八年（1679年），应监修明史徐元文之邀，以布衣参史馆，不署衔、亦不受俸。各位撰稿人稿子写成后请他审阅，他阅后提出应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入，或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闻者如言而去查阅，“无爽者”。他前后在史馆历时十余年，最后卒于京邸王鸿绪明史馆，为修《明史》作出了重大贡献。梁启超称其为浙东“第二位”史学大师。

全祖望是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在清代浙东学派中，全祖望是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因此，梁启超称全祖望是继黄宗羲、万斯同之后的“浙东第三位史学大师”。钱穆则说全祖望是“浙东史学大柱”。

章学诚是清代浙东学派的殿军。他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生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章学诚出生时，黄宗羲已逝世四十余年，因而章学诚与黄宗羲不可能有直接的传授关系。然而，若从思想上来分析，章学诚则明显地继承了浙东学派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并把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章学诚生活在所谓的“乾嘉盛世”，当时汉学盛行，学者埋头于名物训诂，而闭口不言现实。章学诚很不满意这种脱离实际的学风，大声疾呼学术研究必须经世致用。他发展了黄宗羲学者“必先穷经”，并“兼令读史”的思想，明确地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著名命题。在他看来，六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这就是说，六经皆是经世致用的典籍，所以，后世学者研习六经，不应徒在文字上着力，而应该学习和借鉴其中经世的成功经验。与“六经皆史”的见解相联，章学诚又明确地提出了“史学所以经世”的主张，指出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必须做到经世致用，否则就不配谈论史学。正因为章学诚与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学派，在学术思想上有紧密的渊源关系，因此，学者们把章学诚视为是清代浙东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完全是合乎情理的。梁启超说：“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实为确论。钱穆则从自明代以来“浙学”发展史的角度，肯定了章学诚集大成者的地位。他指出：“故余谓晚近世浙学，基址立自阳明，垣墙扩于梨洲，而成室则自实斋。”亦有一定道理。当代学者仓修良先生更是明确地指出，章学诚因与清代浙东学派在“学术上具有师承关系”，因此是浙东学派的一个成员。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看到,黄宗羲开创的清代浙东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中,有浙东“第二位”史学大师之誉的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及门弟子,被称为“浙东史学大柱”,或“浙东第三位史学大师”的全祖望,则是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居于“成室”者或“殿军”地位的章学诚,虽然与黄宗羲并没有直接的传授关系,然而在“学术上具有师承关系”。据此,我们认为,黄宗羲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 2. 孕育了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风格

每一个学术流派不仅有其代表人物,而且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必定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风格,我认为以下二点是最基本的。

第一,主张学术经世致用。浙东学者主张学术研究应该以经世致用为宗,其渊源流长,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之学”。事实上,这二个学派也确实给黄宗羲的思想以很大影响。不过就清代浙东学派而言,主张学术研究应以经世致用为宗的学术风格,其源头在于黄宗羲。他说得很明白,“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仅穷经的目的在于“经世”,而且学史也同样是为了“应务”。他指出:“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在《补历代史表序》中又说:“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这就是说,在黄宗羲看来,无论是研究经学,还是研读史书,目的都是为了经世致用。可以说,经世致用既是黄宗羲开展学术研究的宗旨,也是他从事教育活动的方针。这一思想,为他的学生所继承和发扬,成为清代浙东学派最重要的特色。

万斯同深得黄宗羲经世致用思想的精髓。他治史非如后来之乾嘉学派那样,以考据为目的,而是重在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为后来者提供历史借鉴。他说:明朝“二百九十三年之得失,竟无成书,其君相之经营创建,与有司之所奉行,学士大夫之风尚源流,今日失考,后来者何所据乎?”研究历史是为了使“后来者”能够“作而行”或“有所据”,万斯同的这一思想,正是对黄宗羲学史“足以应务”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全祖望对于黄宗羲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集中表现为对明末忠臣义士和清初“隐逸之民”的表彰。清康、雍、乾三朝的统治者,相继采用威胁利诱,双管齐下的手段,企图压制和消灭汉族中,尤其是汉族士人中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全祖望正是在这样“难乎其为知识分子的时代”,接过了黄宗羲业已开始的“表章明季忠节”的事业,“广修粉社掌故、桑海遗闻”,撰写了许多表彰明末忠臣义士和清初遗民的碑传志表。全祖望的表彰文章,既保存了大量明末清初的珍贵史料,同时,也将他对清朝统治尤其是对大兴文字狱,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大量焚毁书籍的文化专制的不满,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形之于文字。这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也是有时代表意义的。全祖望的表彰文章对清末许多人的反清革命斗争起了积极作用。梁启超曾说:“晚清革命家,受他暗示的不少”。道出了全祖望表彰明末忠臣义士和清初遗民的实际经世意义。

乾嘉时代的章学诚则更是在当时学者因慑于统治者文化专制的淫威,而不敢研究现实,埋头于名物训诂,专志于古代文献整理考订,考据之风盛行的情况下,“不屑屑于考证之学”,大声疾呼学术研究必须经世致用,喊出了“学问所以经世”,“史学所以经世”,“文章经世之业”等时代强音,将黄宗羲开创的,经万斯同、全祖望继承与发展的清代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旗帜又重新高高擎起,“把浙东史学诸大师的这一思想特色(指经世致用——

引者注)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真正做到了集浙东史学之大成。”<sup>①</sup>对于改变当时考据之学脱离实际的不良学风发生了一定影响。

由上可见,梁启超认为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到章学诚的“浙东学风”,“厘然自成一系统”,这是颇有道理的。他所谓的“自成一系统”的“浙东学风”,其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主张学术经世致用。

第二,擅长史学。黄宗羲创立的清代浙东学派,在史学、经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学术界所称道。然而,相比较而言,清代浙东学派对后世贡献最大,影响最显著的,还是在于史学。对此,章学诚通过对清代浙东浙西之学的比较,得出:“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梁启超在对明末及清代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中,也认为:浙东学派“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正因为如此,所以学术界长期以来称这个学派为“浙东史学派”,虽说这样的名称未免有“偏颇”之嫌,但也确乎反映了清代浙东学派擅长史学的特色。

清代浙东学派擅长史学,不仅奠基者是黄宗羲,而且他治史的一些基本特点,也影响了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他们所继承和发展,并从史学理论上给予总结,形成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高峰。例如,黄宗羲重视学术史的研究,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后,完成了《明儒学案》一书,对明朝二百七十多年儒学,尤其是王学的发展演变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学术思想史专著。诚如梁启超所云:“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晚年,黄宗羲又开展了对宋、元学术史的研究,不过仅成十七卷而卒。黄宗羲重视学术史研究的特点,为全祖望所继承。他接过了黄宗羲未竟的事业,研究宋、元学术史,自乾隆十年(1745年)至十九年(1754年),前后整整用了10年时间,撰成《宋元学案》一百卷,此书与《明儒学案》比较,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更注意人物之间的师承传授关系,凡所记人物,都注明其家学、门人、私淑以至再传、三传、四传和续传,对同一辈的人,又作讲友、同调、学侣的区分,以明学术思想之渊源、流变。又如,黄宗羲治史具有重当代史的特点。已如上述,他研究学术史是由明朝而推及宋、元的。同时,他又收集、整理了大量明代史料,选编成《明文案》二百零七卷,后来扩编为《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又从中精选成《明文授读》六十二卷,作为季子黄百家的“读本”。他有志撰写明史,曾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据全祖望说,黄宗羲现存有关南明历史的著作《赣州失事》、《绍武争立纪》、《四明山寨记》、《舟山兴废》等,都是其中的内容。继承黄宗羲这一史学特点最突出的是万斯同。他博通诸书,尤熟明代掌故,明十五朝实录,几能成诵。康熙十七年(1678年),他拒绝应征参加博学鸿儒科的考试,而于次年应聘入明史馆,以布衣身份修明史,在馆十余年,撰成《明史稿》五百卷,最后卒于明史馆,真正做到了如全祖望所言“以任故国之史事报故国”。章学诚不仅擅长史学,并且从理论上作了总结,提出了“六经皆史”,“史学所以经世”,史学家除具有才、学、识之外,还必须具备史德等史学理论,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出现之前,古代史学理论的高峰。因而,梁启超称他为“历史哲学家”,并非为溢美之词。

应该指出的是,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所集中阐发的反封建君主专制的民主思想,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原因,没有能被他的学生所很好地继承和发展。直至清末,才被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接受,成为他们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中

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是黄宗羲反封建君主专制民主思想的真正传人。

## 二、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起了启蒙作用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清末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斗争中，在接受西方传入的文化学说的同时，也从中国固有的民主思想资料中，尤其是从黄宗羲等“残明遗老”的思想中吸取营养，成为他们重要的思想来源，推动斗争发展的“原动力”。

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在清初即受到顾炎武的推崇，他致书黄宗羲说：“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还说：“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汤斌也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在京师叶方蔼处读到《明夷待访录》，致书黄宗羲，称赞“见先生经世实学”。然而，象顾炎武等这样独具慧眼的人，在当时委实不多。同时，在清政府文化专制统治下，《明夷待访录》在“乾隆间入禁书类”，因此，该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流传不广，影响不大。直至清末光绪年间，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思想家为之宣传，秘密翻印，广为散发，“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才对中国的生活产生实际的重大影响。梁启超说：“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又说：“光绪间我们一班朋友曾私印许多送人，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当然，梁启超等人在清末提倡“民权共和之说”，“宣传民主主义”，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中，之所以如此大力宣传《明夷待访录》，希冀通过它，唤起民众“民族意识觉醒”，“从事于推翻几千年旧政体的猛烈运动”，首先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思想曾受到该书的启蒙。对此，梁启超明确表示：《明夷待访录》“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同样，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慧星”的谭嗣同，也很推崇《明夷待访录》，甚至认为三代以下几乎无可观之政，无可读之书，唯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王夫之的遗书，才值得一读。而且，谭嗣同揭露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主张“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等思想，明显地是受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等篇的影响。

另外，严复在《辟韩》中愤懑抨击“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也使我们看到了黄宗羲“君为天下之大害者”思想的影子。

事实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不仅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受到黄宗羲民主思想的启蒙，而且，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也同样受到黄宗羲思想的深刻影响。而对于后者，却一直鲜为人道。我认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学校应该议论国家政事的思想，为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所接受。在维新运动期间，他们积极创设学校借以倡言民权，鼓吹革命，从事维新变法活动。例如，上文说到的梁启超等人于光绪年间私印散发《明夷待访录》，就是发生在他主讲湖南长沙时务学堂期间。该学堂为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等设立，聘梁启超主持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回忆，当时他“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

故实，庐举失政，盛倡革命”，“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待学生放年假返回家乡，“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引起整个湖南很大震动。再加上他们又私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上按语，秘密散发，进一步扩大影响，传播革命思想，致使信奉者与日俱增，“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可见，时务学堂事实上已成为当时湖南维新派宣传革命思想，从事维新变法活动的重要基地。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也受到黄宗羲学校议政思想的影响，在《建国方案》中提出“以学校为鼓吹之地”，把学校作为宣传三民主义，反对君主专制统治，开展革命活动的阵地。1909年，李滋然撰写《明夷待访录纠谬》一文，他站在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立场上，为了申张君权，特别抨击黄宗羲关于学校应该纠绳政治的主张，认为“后世士气嚣张，未有研究科学之本心，先逞干预政治之能力，动不动便联名纠众，电达政府，煽诱人心，这都是黄宗羲之论有以启之。”则从反面证明了黄宗羲关于学校议政的思想，对于晚清士人投入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革命斗争所起的积极作用。

其次，黄宗羲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启迪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黄宗羲认为中国历史上取士制度的弊病，至科举考试制度表现得最为严重，而科举考试制度中的弊病，又在八股取士制度中反映得最为突出。“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并且深刻地揭露了科举考试制度的种种危害，指出“科举盛而学术衰”，科举之学“举一先生以废百”，科举之学“陷溺人心”，败坏学风等。然而，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的要求，只是主张改革科举考试制度。不过，黄宗羲对科举考试制度危害的揭露和批判，对维新思想家起了启蒙作用。对此，梁启超直言无讳。他说：黄宗羲等“痛论八股科举之汨没人才，到这时候读起来觉得句句亲切有味，引起一班人要在这束缚思想、锢蚀人心的恶制度拼命。”于是，他们便纷纷猛烈抨击科举考试制度，认为“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并进而发出了“废科举”的时代强音。在朝野一片反对声中，清政府不得不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终于寿终正寝。这虽并非为黄宗羲所企求，然而却是他和清初的大师们批判科举考试制度所引出的必然结果。

再次，黄宗羲主张普遍设立学校，实现“郡邑无无师之士”，“亦无不用之人”的理想，对康有为等维新思想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提出在全国建立太学、郡县学和蒙学三级学校系统，并且要求将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小者改为小学，实现“郡邑无无师之士”，士之学成者，“亦无不用之人”，即人人都能受教育，个个都能尽其才的理想。在清末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要求在全国建立乡设小学，县设中学，省设专门高等学及大学的学制系统。为了实现这一设想，他也同样提出改寺庙为学堂，以庙产为办学经费的主张。在康有为的这一主张中，明显地有黄宗羲思想的影子。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的上述主张曾被光绪皇帝所接受，寺庙改为学堂一度成为事实。

注释：

① 仓修良：《章学诚和〈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2页。

（责任编辑 黄新宪）